



历史书写的三重变奏：战后美国小说的 反思路径研究

王端生

(梧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西, 梧州 543003)

The triple variation of historical writing: Study on the reflection path of American novels after the war

Wangduans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zhou University, Wuzhou 543003, Guangxi)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 wave of literary creation with the theme of historical reflection rose in American literary circles. Through text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context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divides the postwar American historical reflective novels into three representative types: realistic war writing (1940–1950s), black humor historical irony (1960s) an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narrative (1970s). The study found that Irving Shaw's *The Lion Cub* (1948) used realism to systematically present the war trauma and social memory; Joseph Heller's *Catch-22* (1961) deconstructs the absurdity of war logic through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black humor; Robert Coover's *Public Anger* (1977) uses postmodern narrative techniques to reallocate the historical discourse power. These three types show the evolution track from historical reproduction to historical deconstruction, which not only reflects the paradigm shift of American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gnition, but also reveal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narration and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American novel; Historical reflection; Historical context; Text analysis

摘要：二战结束后，美国文学界兴起了以历史反思为主题的创作浪潮。本文通过文本分析与历史语境考察，将战后美国历史反思小说划分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类型：现实主义战争书写（1940–1950年代）、黑色幽默历史反讽（1960年代）和历史重构叙事（1970年代）。研究发现，欧文·肖《幼狮》（1948）采用现实主义手法，系统呈现了战争创伤与社会记忆；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通过黑色幽默的叙事策略，解构了战争逻辑的荒诞性；罗伯特·库弗《公众的怒火》（1977）则运用后现代叙事技巧，实现了对历史话语权的重新配置。这三种类型呈现出从历史再现到历史解构的演进轨迹，不仅反映了美国社会历史认知的范式转变，更揭示了文学叙事与历史建构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美国小说；历史反思；历史语境；文本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小说里，对历史，特别是对战争、对某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社会问题展开反思的优秀作品接连涌现，持续不断，直至二十世纪末，在美国文学史的大花园里构成了

一道亮丽的景致。认真研读战后美国文学史便能发现这般规律：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较为平静安稳，这一时期的美国小说对历史的反思主要体现为对战争的记载与追溯，大多以战争亲历者的口



吻,用现实主义的笔法记录战争的惨烈,揭示人性的懦弱等;六十年代的美国小说则在社会剧烈动荡、反叛浪潮接连不断的大环境下,开始以黑色幽默的格调反思战争,质疑战争的合理性,揭露战争中人类的堕落与贪婪,展现出对历史的怀疑与嘲讽;进入七十年代之后,美国社会危机频现、政治丑闻不断,人们对社会政治产生了强烈的失望感,美国小说对历史的反思更为极端,出现了一些彻底否定和颠覆历史,并明确宣称要重构历史的小说^[1]。

一、现实主义的历史铭写:战争创伤的文学见证

(一) 战争暴力的具身化呈现

战后至五十年代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相对安定,人们生活优渥。在冷战阴云的笼罩下,反思历史的小说主要是对战争的记录与回溯。约翰·赫塞以新闻报道的笔法再现历史事件。他凭借二战期间于欧洲和远东担任战地记者的丰富阅历,写出了《广岛》(1946)和《墙》(1950)。前者通过幸存者的活动如实记录了原子弹对城市的摧毁以及日本普通民众的不幸遭遇和痛苦,后者则从受害者视角再现了德国纳粹分子对华沙犹太人的血腥镇压^[2]。詹姆斯·科曾斯曾在美国空军服役,他的《荣誉卫队》(1948)讲述的是战争期间发生在美国本土佛罗里达州一个空军基地的事儿,从一名军官的视角书写军队中复杂的种族关系,展现军队内部指挥系统的运转。欧文·肖战时也是军人,曾在北非、欧洲和中东服役,他的《幼狮》(1948)揭露了美国军队中令人发指的仇犹排犹状况。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1951)在描写士兵与军官的冲突时揭露了军队里的专制、野蛮、暴力等丑恶面。赫尔曼·沃克的《该隐号兵变》(1951)通过记录该隐号扫雷舰上发生的一桩桩事件颂扬了部队军官指挥部队的本领。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1948)客观呈现战争的残酷场景,以军队隐喻整个美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揭示其间的权力结构及其与人性的冲突,写得颇具深度,十分成功。当然,回顾战争的小说并非仅出现在这个时期,库尔特·冯尼格特的《花招》(1991)就是对越战的回顾与省思。欧文·肖的《幼狮》是这类小说的代表^[3]。

(二) 权力结构的微观映射

《幼狮》是欧文·肖的成名之作,1948年出版后,受到批评家和读者的广泛关注,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战争小说之一,被公认为是西方描绘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佳的三部长篇小说之一。小说以两个美国士兵诺亚·艾克曼和迈克尔·惠特克以及一个奥籍德军士兵克里斯琴·里斯特尔的遭遇为主要线索,以写实的手法,从1937年除夕写到1945年法西斯德国覆灭的前夜。小说通过一系列事件的描述,记录了战争本身的残酷,刻画了战争对军队中军官和普通士兵的异化,揭露了军队中严重的仇犹排犹现象^[4]。

(三) 边缘群体的历史证言

《幼狮》记录了战争本身的残酷。正如英国谚语所说:“战争一开启,地狱之门便敞开了。”在德军官兵眼中,自己部队的士兵和占领区百姓的生命如同草芥。在意大利的一次战斗后的撤退过程中,中尉哈登堡发现自己的连队几乎没有逃生的可能时,一边命令自己连队的士兵在无处可逃的沙坡上挖掘壕沟,一边谎称自己和克里斯琴去找迫击炮队支援他们的防御而伺机逃走,克鲁伦则坚决要跟着哈登堡离开。发现克鲁伦这一企图后,哈登堡便动手打人,而克鲁伦决意要跟着走,哈登堡就朝他开了枪。在英军的强大攻势下,其余的士兵很快成了英军的炮灰,哈登堡则带着克里斯琴逃命去了^[5]。更令人恐怖的是,在第三十章,美国空军对德军阵地狂轰滥炸之后,竟把炸弹往己方待命出击的步兵头上倾泻;在第三十六章,美军的一个排奉命向一个虚实不明的德军阵地冲锋,其时正好从后方上来三个一心想捡“洋捞”自肥的军需官,这些士兵为了保全自身便引诱军需官们冒失上前,进入危险地带,作为活靶子吸引德军火力,以三条自己人的生命为代价测得德军机枪火力点的位置,传令炮兵予以摧毁。在这种盲目肆虐的毁灭面前,战争的是非对错以及敌我界限也就消失了^[6]。《幼狮》刻画了战争对军队中军官和普通士兵的异化。残酷而恐怖的战争加剧了德军官兵对死亡的恐惧,为了忘却战争的恐怖,不少官兵寻欢作乐,在放纵的性生活中寻求刺激和慰藉,似乎战争的恐怖、对死亡的恐惧,一切的一切,都可以通过寻欢作乐来消除、来释放。德



军中尉哈登堡、下士克里斯琴就是典型的纵欲之徒，他们不分时间场合，也不分对象是谁，只要有可能会就绝不放过，从中寻求刺激，求得慰藉。这是解除一切愁闷的情感游戏，异常热烈而又彼此心照不宣，在与女人的交往中，征程的艰难、战争的恐怖完全消失了。这一切都表明，在战争中，性似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美国军队中，情况亦是如此，刘易斯上尉便是很好的“范例”。《幼狮》还揭露了美国军队中严重的仇犹排犹现象。犹太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诞生过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优秀的民族，在二战中饱受了希特勒纳粹的极端仇视，进而惨遭屠戮。这种仇犹排犹的情绪不仅在纳粹德国盛行，也波及到了二战中的美国军队^[7]。这种严重的仇犹排犹现象在犹太士兵诺亚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诺亚自愿报名参军，不仅饱受肉体上的虐待，无端地遭受打骂斥责，接受根本莫须有的惩罚，而且在精神上受尽侮辱，士兵们经常冷嘲热讽地谈论政治，故意拿希特勒来讥讽犹太人，甚至有人埋怨是犹太民族使大家卷入了战争。

二、荒诞化的历史祛魅：黑色幽默与战争逻辑的解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处于动荡之中、风云变幻，美苏冷战正激烈、肯尼迪遇刺身亡，美军深陷越战困境、猪湾登陆失败，国内种族矛盾加剧、马丁·路德·金遇害，民众反抗情绪高涨、嬉皮士走上街头抗议，女权主义流行、否定传统成风。这样的社会状况自然影响到了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美国小说以黑色幽默的风格反思战争，质疑战争的合理性，揭露战争中人类的堕落与贪婪，体现出对历史的怀疑与嘲讽。

（一）官僚体制的悖论性批判

约瑟夫·海勒的著名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开创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先河，以荒诞手法呈现专制、贪婪、腐败的世界。它是海勒首部作品和成名作，出版后声名远扬，为美国当代小说树立全新风格，是“黑色幽默”典范^[8]。

小说讲述二战期间，美国空军飞行大队驻扎在地中海皮亚诺扎岛的故事。它未塑造“英雄”人物，围绕主人公尤索林展开一系列普通人形象。

尤索林怀疑上级命令会致命，千方百计保全性命，成了怀疑论者，想逃离。他装病躲进医院又逃走，因治疗会让人身心改变。“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停止飞行需本人申请，但能申请说明神志清醒，还得继续飞；执行25次以上飞行任务可复员，但上级不断增加次数。尤索林为保命，借口通讯故障返航、让飞行员拉肚子、偷改轰炸机图纸等^[9]。

小说并非探讨战争正义性和军人品德，而是展现普通人与美国官僚体制的矛盾冲突，揭示当权者肆意妄为、社会物欲泛滥、自私自利的疯狂与混乱，即“有组织的混乱”与“制度化的疯狂”。

此外，海勒塑造不少象征美国官僚专横、僵化、贪婪、腐败的单一维度人物。如卡思卡特上校，性情残暴，对上司阿谀、对下属专横，一再提高飞行次数；谢思科普夫少尉为比赛异想天开，中队获胜后他仕途顺遂直至成为将军。这类平庸之辈在官僚环境中扮演英雄角色，暴露美国官僚体制的僵化、残忍、机械和无意义^[10]。海勒以冷峻幽默刻画众多军官形象，揭露军国主义者残酷，用喜剧形式处理悲剧内容，让读者体会时代和逻辑的荒唐，揭示美国社会尤其是军队及其战争的虚伪性。

（二）反英雄叙事的颠覆性力量

库尔特·冯尼格特的著名小说《猫的摇篮》（1963）详细描绘了1945年8月6日这一天，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的事件。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的记录，它更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对科学技术的过度迷信和依赖，以及这种迷信所带来的“愚蠢”行为。冯尼格特通过这部小说表达了他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深切忧虑。

在这部小说中，冯尼格特创造了一个荒诞不经的世界，其中的人物行为古怪，思想奇特，但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却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在面对极端科技力量时的盲目和无奈。小说中的虚构物质“九号冰”被描绘为一种潜在的毁灭性力量，它实际上是对现实世界中核武器的隐喻。通过这种虚构的物质，冯尼格特讽刺了人类对科技力量的盲目崇拜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巨大灾难。

冯尼格特在这部小说中采用了反英雄人物作为主角，这些角色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气概，反而常常表现出怯懦和自私。然而，正是这



些有缺陷的角色,让读者看到了在战争与科技的双重压力下,人性的扭曲与抗争。这种反英雄叙事的颠覆性力量,不仅挑战了传统的战争叙事方式,更促使读者深入思考科技进步与人类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科技日益强大的今天,冯尼格特的这部作品提醒我们,如何在科技不断进步的同时,保持人类的理智和良知,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猫的摇篮》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社会在科技发展面前的种种困境和挑战。

(三) 尤索林作为“非典型主角”对传统战争英雄的解构

库尔特·冯尼格特的《第五号屠场》(1969)是一部具有深刻意义的小说,它以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深邃的反战主题,对盟军在二战期间对德累斯顿进行毁灭性轰炸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部战争小说,更是一部探讨人类本质的文学作品。小说的主人公比利·皮尔格林是一个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幸存下来的美国士兵,他的经历贯穿了整个故事,成为读者理解战争残酷与荒谬的窗口^[11]。

冯尼格特通过比利的视角,用一种戏谑而深刻的笔触,解构了传统战争叙事中的英雄主义与崇高感。在传统叙事中,战争往往被描绘成英勇与牺牲的颂歌,但在《第五号屠场》中,冯尼格特呈现了一种全新的对历史与战争的理解。比利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勇战士,而是一个在战争洪流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人。他的经历与感受,是对战争逻辑最直接、最有力的颠覆。

冯尼格特通过比利的口吻,对战争的荒诞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揭示了战争背后隐藏的权力欲望与人性的扭曲。这种反英雄叙事的颠覆性力量,不仅挑战了读者对战争的固有认知,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历史与战争的真实面貌。在冯尼格特的笔下,战争不再是英勇与牺牲的颂歌,而是人类自相残杀的悲剧,是对人性与文明的残酷践踏。

《第五号屠场》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深刻的反战主题震撼了文坛,成为一部经典的反战文学作品。冯尼格特通过这部作品,不仅质疑了战争的必要性,更深入探讨了人类在战争中的行为与

心理,以及战争对人性的摧残。这部小说不仅是对历史的一次深刻反思,也是对人类未来的一次警示。

三、后现代的历史重构:权力话语的戏仿与重置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发生的事件,让美国社会更加疑惧交织、恐慌弥漫:石油危机、美元贬值、经济下滑、越战失败、水门丑闻,让美国民众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政府彻底失去信任。在文学领域里,体现为以极端、叛逆的方式反思历史,否定过往历史的真实性,否定官方历史的可信度,并且在解构历史的同时进行重构。这类小说有罗伯特·库弗的《公众的怒火》(1977)、唐·德里罗的《天秤星座》(1988)和《地下世界》(1997)。

(一) 政治事件的文本化戏仿

《公众的怒火》取材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真实发生过的一起耸人听闻的历史事件——罗森堡夫妇间谍案,讲述了罗森堡夫妇1953年6月19日被电刑处死前两天所发生的事。在作品中,作者通过对真实历史人物和具体历史事件进行戏仿,颠覆并重构历史,以此表明他的观点:历史与现实皆是人虚构的。

这部小说涉及当时美国政坛半数以上的人物,作者大胆采用“漫画”手法,把那些被社会传统媒介描绘得道貌岸然的政治精英、公众人物,塑造成行为猥亵、形象丑恶的无耻之徒。小说主要刻画与塑造的是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实际上,这部小说是由尼克松本人讲述自己在罗森堡一案前后的经历与感受。在作者笔下,身为副总统的尼克松毫无政治领袖的伟岸与英明,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玩弄政治的跳梁小丑。他公然到国会山为朋友参议院领袖比尔·诺兰“帮忙”,让美国所谓民主政治三权分立的谎言暴露无遗;他个人形象极差,生活都难以自理,坐车卡鞋,穿衣扣不上纽扣,走路踩狗屎等。更令人发指的是,他身为副总统,打着探望囚犯调查真相的幌子与伊瑟尔缠绵做爱,之后光着屁股到时报广场号召大家“为了美国脱下裤子!”这种创作手法(戏仿、反讽、内省、自我反映)是对社会和文学权威压迫力量的直接挑战。《公众的怒火》戏仿历史事件,把罗森堡案描绘成一场闹剧,而非严肃的政治、人命关天的



国家事件。对于罗森堡夫妇死刑判决，作者认为“这么做有理由：有戏剧性的理由，有政治性的理由，也有心血来潮的随意理由”。所以从作品开篇，作者就以玩世不恭的口吻和笔法嘲讽这一案件的欺骗性与荒唐性。此外，作者把罗森堡夫妇的行刑场设在最能代表美国社会和美国精神的纽约时报广场，让这场充满隐晦与武断的政治闹剧变成马戏表演般的小丑表演：有交通管制造成的拥堵，有大批群众围观，有合唱队助兴，有电影纪录片播放，混乱至极^[12]。小说最后一章叙述了罗森堡被处死的具体情形：合上电闸，罗森堡被电死，“他的身体倒进椅子，像一块烂布”。现场检尸大夫宣布：“我宣布此人已死。”但人们把他尸体抬上停尸架时，“他嘴里还嘟囔着什么”。处死伊瑟尔时，罗森堡又复活，加入围观者行列“内心体验着他所经历的过程”。在这样的历史事件描述中，读者根本无法分清何为历史事实，只感觉到混乱与幻想——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小说将这一政治事件神话化，用虚构文本表明：所谓历史完全是人为虚构的产物。

（二）历史与虚构的边界实验：唐·德里罗的《天秤星座》

在探讨历史与虚构的边界时，唐·德里罗的《天秤星座》无疑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案例。这部作品巧妙地将历史事件与虚构情节交织在一起，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质疑何为真实，何为想象。德里罗以其独特的叙事技巧，将肯尼迪遇刺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重新呈现，但并非简单地复述事实，而是通过虚构人物的视角和内心独白，揭示了事件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和心理层面。

在《天秤星座》中，德里罗不仅仅关注刺杀事件本身，更是深入探讨了美国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所经历的动荡与变革。他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将读者带入那个时代的氛围，感受到当时人们的思想状态和情感波动。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结构，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反思历史与虚构的界限。

德里罗的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再现，更是对历史叙述方式的探讨。他通过虚构的元素，挑战了传统历史叙事的权威性，提出了历史并非一成不变的客观事实，而是可以被重新解

读和构建的。《天秤星座》以其独特的文学魅力，让读者在享受阅读的同时，也对历史与虚构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思考。

总之，这些小说皆出自美国主流作家笔下，他们不像黑人作家、犹太作家、华裔作家等少数族裔作家一样，有着与生俱来的回忆与反思“倾向”。所以，他们对自己所属主流社会力量主导的历史展开积极回顾与反思、质疑与反讽、颠覆与重构，很好地展现了美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与进步，也很好地印证了美国作家的不断成熟与超脱。就像弗洛伊德所言：“只有健康的人才能勇敢回忆自己的过去，只有健康的社会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历史。”

参考文献：

- [1] 张明远. 创伤记忆与历史重构：论二战题材美国小说的叙事策略[J]. 外国文学研究, 2021, 43(3): 112-120.
- [2] 李晓红. 黑色幽默的颠覆性：约瑟夫·海勒小说对战争话语的解构[J]. 当代外国文学, 2022, 43(2): 89-97.
- [3] 王思远. 后现代历史叙事的可能性：罗伯特·库弗小说的档案虚构[J]. 国外文学, 2020, 40(4): 156-164.
- [4] 陈雪梅. 冷战阴影下的身体政治：诺曼·梅勒的暴力书写[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19, (1): 78-86.
- [5] 黄文杰. 从见证到戏仿：美国战后小说历史书写模式的演变[J]. 外国文学评论, 2021, (4): 145-153.
- [6] 刘志强.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隐喻系统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2, 45(5): 132-140.
- [7] 周晓琳. 历史创伤的文学疗愈：冯内古特的记忆书写[J]. 外国语文, 2023, 39(1): 67-75.
- [8] 赵立新. 元小说视域下的历史重写：多克特罗的叙事政治[J]. 当代外语研究, 2020, (3): 101-109.
- [9] 孙伟民. 战争记忆的媒介化：《广岛》的新闻体叙事[J]. 中国比较文学, 2021, (2): 178-186.
- [10] 马丽华. 解构与重建：后现代美国小说的历史真实性[J]. 国外社会科学, 2022, (6): 123-131.
- [11] 吴志强. 权力话语的戏剧化：《公众的怒火》的滑稽模仿[J]. 戏剧艺术, 2020, (5): 89-97.
- [12] 林小梅. 从《幼狮》到《第五号屠场》：战争小说的道德观嬗变[J]. 伦理学研究, 2019, (4): 112-120.
- [13] 郑文静. 后现代历史编纂学与文学叙事的融合[J]. 文艺理论研究, 2021, 41(5): 156-164.

作者简介：王端生（1988-3），男，汉族，广西桂林人，硕士，梧州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